

共产党情报局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

——从新民主主义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转变的国际背景

任晓伟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共产党情报局是1947年苏联推动下建立的一个特殊国际机构,虽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成员党,但共产党情报局的理论和政治活动对建国前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有着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对共产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理论的接受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境,对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共民族主义的支持压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存在的意识形态空间,共产党情报局对苏联模式的强化则提供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替代发展模式。

【关键词】共产党情报局;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D17/D6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1-0026-13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①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实际为着眼点,从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特殊关系,形成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多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体制和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混合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体制,从而建构起一个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模式。其核心在于,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历史实际出发,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在战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②,并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放置到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图景之中。二是,发展多个阶级联合的民主,而不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专政。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建国后并没有能够长期坚持

下去,新中国建立不久很快就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以苏联模式为参照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被放弃的问题。联系着共产党情报局的主要活动期涵盖了中国革命的最后发展阶段、新中国建国方案的确定时期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时期来看,共产党情报局对建国前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历史走向的影响客观上是不能忽视的。

一、共产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境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能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形成并不断成熟,与美苏在“二战”时期形成的战略同盟关系是分不开的。美苏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使十月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0-11-02

【作者简介】任晓伟(1974—),男,陕西清涧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副教授,法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09SZYB16)。

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开始从长期的对抗转向妥协与合作,这一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索本国发展的既非西方资本主义又非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其重要的外部条件。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1](P675)}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理解为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形式”,客观上折射出当时以美苏合作为基础的相对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正是在这一环境中毛泽东形成了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比起“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2](P183)}的判断,这一判断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治空间。1945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高度肯定“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后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革命性作用以及战后中国走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也是以对战后美苏合作和大国团结的判断为基础的。

“二战”期间的美苏战略同盟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反法西斯主义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一是从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到波茨坦会议所达成的一系列关于战后世界政治安排和利益划分的协定。但是,尽管美苏在战后初期都试图把战时的同盟关系延续下去,但在具体实现利益协定的过程中,双方在欧洲、中东、远东矛盾的不断滋生和扩大推动着美苏的战时同盟关系逐渐开始破裂,进入了以集团性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冷战状态。战后苏美关系的变化逐渐开始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境。

从抗战结束到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对国际政治的独特认识。1946年4月毛泽东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强调在美苏关系妥协的背景下中国革命并不需要进行国内的妥协,中国共产党仍然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革命斗争,这是对美苏关系及其对中国革命影响的一个非常可贵的认识。尽管与之前毛泽东对美苏关系的判断有明显的不同,但“中间地带”理论并不强调美苏矛盾是世界政

治的主要矛盾,这一点应该是与之前毛泽东对国际政治的认识相同的地方。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前,毛泽东还在继续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革命前途,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仍然试图在“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础上使中国走一条如《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讲的第三条道路。但是1947年底1948年初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迅猛发展,面对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和美苏冷战的发展,毛泽东在思考新中国国际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开始接受了共产党情报局“两个阵营”的理论。毛泽东对“两个阵营”理论的接受,不仅改变了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政治和时代发展的认识,同时,也由此带来了整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历史走向的变化。

1948年11月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了毛泽东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这篇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毛泽东在接受了“两个阵营”观点的基础上否定了任何意义上的中间道路的可能性,指出:自十月革命以来“三十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苏联的人们,一切企图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地的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路线’,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彻底虚伪和彻底破产吗?”^{[3](P2)}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同时,强调“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4](P1472,1473)}被毛泽东所否定的“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不仅是指战后初期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国共两党之外提出的建国主张,在更广意义上或者说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包括了介于资本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之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道路。东欧国家在“两个阵营”理论基础上放弃前一时期的“人民民主道路”开始与苏联制度一体化表明,“两个阵营”理论不仅是一种对世界政治发展的认识,而且是与对战后发展道路的抉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两个阵营”理论与苏联模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只有在“两个阵营”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才能形成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唯一正确的科学的观点,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反映了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共同规律。”^{[5](P670)}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美苏关系的对立以及作为这一对立理论表现形式的“两个阵营”理

论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接受“两个阵营”理论的过程不得不同也是客观上开始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向苏联模式靠拢的过程。

“两个阵营”理论在苏联模式向中国扩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美苏冷战的条件下,一定意义上说,接受了“两个阵营”理论就意味着为苏联模式在本国的扩展打开了大门。既然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认可了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对于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总的斗争的结果之一部分”^{[6](P24)},那么苏联模式在中国的推广和确立就具备了意识形态上的依据。1954年9月,刘少奇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7](P26)}对“两个阵营”理论的接受在推动东欧国家向苏联模式制度转型的同时,也使得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确立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民族主义的批判压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存在的意识形态空间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为着眼点形成的特殊社会形态理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与政权形态。”^{[8](P317-318)}这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必须要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不断民族化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为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宽广的意识形态空间^③。正是由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构建与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民族化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把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内的整个毛泽东思想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9](P333)}。

但是,1948年后,苏联操纵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民族主义的批判,极大地压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意识形态空间。南共是“二战”

期间欧洲范围内唯一的的同时应对了盟国和苏联的双重压力,把国内的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以自身的力量获得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但由此也形成了后来苏南矛盾和冲突的根源。不管什么样的具体因素导致了苏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实质却在于执政的南共所代表的民族利益与苏联的大国利益之间的尖锐冲突。^{[10](P185-190)}面对南共一系列的“擅自行动”对苏联在东欧的外交目标和安全体系的威胁,通过批判南共的民族主义来抑制东欧国家的离心倾向,把东欧国家的政治行动限制在苏联外交政策的框架内就成为共产党情报局的重要政治任务。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对整个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一批判的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苏联主导下社会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内在政治逻辑,即乔治·凯南所分析的,“苏联的权力概念,不允许在党外存在任何组织中心,要求党的领导在理论上保持唯一真理库的地位。因为如果在哪里都能找到真理,那就会为有组织的活动找到正当理由。显然,这正是克里姆林宫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允许的。”^{[11](P102)}

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决议把南斯拉夫一系列不同于苏联的内政外交政策冠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概念严厉批判,指出南共“已经走上了脱离反帝国主义的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走上了贩卖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事业的道路,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12](P48)}。这次会议决定把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但面对南共的不屈服,1949年11月共产党情报局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第三次会议,进一步抬升了对南共的批判。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格·乔治乌-德治在会议上作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之中》的报告。这一报告除了批判和讨伐南共外,而且特别指明这不仅是对一个具体的共产党的组织处理,而且有着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一意义在于:第一,对苏联的态度问题是判断国际主义的根本标准,“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苏联,乃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和准绳”,“凡是陷入反苏主义泥潭的人都不免有滚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道路的危险”;第二,反对南共铁托

集团的斗争“显然具有国际的意义”,因此反对和批判南共“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职责”^{[12](P118-119, J32)}。在德治报告的基础上,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决议指出,南斯拉夫“已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出卖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去了”,已经“落入人民公敌的凶手和间谍手中”^{[12](P68, 72)}。对南共的两次批判使东欧各国产生了强烈的政治震动。东欧各党开始大规模的党内清洗,从1948年到1952年,各党中被清洗的党员总数约为250万^{[10](P220)},许多党的领导人被指责犯了民族主义错误纷纷被撤职或绞死。1948年9月,波兰的哥穆尔卡被撤职。1949年6月,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被公开审理,并于12月被绞死。最著名的是1949年9月对被控与铁托勾结的匈牙利拉伊克的审判,这一审判牵连广泛,有4000名前社会民主党党员被清洗,35万人被开除出匈牙利工人党,15万人被关进监狱,2000人被处决。其中包括3位总书记、1位总统、几位副总理、几十位部长和党的高级领导人、100名将军。东欧党内掀起的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1952年,以惊人的相似性重复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清洗者清洗人”和“清洗者被清洗”的历史过程^{[13], [14](P97-102)④}。

在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推动东欧国家清洗铁托主义分子的过程中,面对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其对中国共产党内出现铁托主义分子的担心也开始不断加剧。1949年3月,美国作家斯诺发表了《中国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吗?》一文,斯诺在该文中明确地把毛泽东比喻为中国的铁托,指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将成为第一个共产党治理下,不跟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大国。”^{[15](P66)} 同样是1949年3月,美国《工人日报》将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解释为“提前欢迎铁托主义”^{[16](P564)}。这无疑加重了斯大林的疑虑,甚至是比之于东欧更加忧虑。因为“苏联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内战,甚至在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还限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的发展,但是后来,苏联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援助,并全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的新政权。的确,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有着五亿多人口的大国里取得胜利,极大地增加了苏维埃集团的力量。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中国不能被指望像保加利亚或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起到苏联卫星国的作用,而事实上,

共产党世界有了第二个领导中心。”^{[17](P517)}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不可能自外于共产党情报局掀起的这场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出于对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判断以及维护苏共的威望和消除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的担心,中国共产党也加入了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之中^{[18]⑤}。后来,毛泽东提到这件事时说,中国革命胜利前“斯大林曾把铁托看作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19](P13-14)}

194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决议肯定了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批评南共领导人“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并认为南共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3](P74)} 8月4日,中共中央修改并转发了中共东北局《关于学习中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的指示》。11月,刘少奇撰写了《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篇理论文章,对南共问题和共产党情报局决议进行了理论阐述。刘少奇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影响,1949年6月1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49年6月7日苏联《真理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但与东欧党对南共的批判相比,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中国共产党虽然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但并没有采取东欧党那样的党内清洗;第二,中国共产党虽然认为南共犯了错误,但并没有对南共的内政外交政策横加指责,对南共的批评更多地是从理论上展开的。特别鲜明的是,在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后,《人民日报》在1949年12月4日发表的《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决议》的1300多字的文章中只有一处具体提到我们热烈拥护这个决议,坚决反对铁托集团^[20];第三,对南共的批判并没有改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政策,特别是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

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远远没有达到东欧党的程度,但仍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两个严重影响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历史命运的因素。

第一,接受并强化了对苏联的态度是检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检验各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化程度这一标准。东北局的指示指出,要“认清苏联是世界反帝的和平民主阵线中的主力军和领导者”,“中国人民必须与苏联结成巩固的兄弟联盟,中国革命才能彻底胜利,任何盲目的反苏思想与情感的残余,必须加以肃清与防止”^{[3](P76-77)}。刘少奇也指出,错误地对待苏联,“如铁托集团所作的那样,乃是极端错误的和有害的,乃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背叛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墮落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的结果”,“反对苏联,必然只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21](P15-28)}在接受了反苏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一标准后,围绕着新中国建国方案的确定,苏联的意见就非常重要了。1948年8月28日,苏联的联络员奥尔洛夫在致莫斯科的电报中转述毛泽东关于赴莫斯科与苏共领导商谈的问题要点时指出:“毛泽东总结谈话内容时强调说‘应该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9月28日,毛泽东在致莫斯科的电报中说:“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22](P57)}把对苏联的态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尺度,客观上已经使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再像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形成时期那样强调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苏联的区别了。

第二,提升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斯大林化程度。面对苏共和共产党情报局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中共客观上感觉到了来自苏联的理论压力。毛泽东在1948年11月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列宁、斯大林式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3](P3)}但中国共产党这一表述显然不能让苏联满意。1949年初面对中国革命的顺利进展,苏联理论界已经开始论证斯大林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一位苏联理论家指出:“斯大林同志的著作,特别是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对党制定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具有重大意义。斯大林同志在这些著作中,根据对中国形势所作的深刻的理论分析,阐明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特点,英明地预示了它的进程并指出它能取胜的条件。”^{[10](P267)}与此同时,共产党情报局的宣传也开始抢夺中国革命的理论话语权,共产党情

报局和各国共产党的宣传都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说成是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是斯大林的观点、战略、忠告和指导的结果,试图把中国革命归结为斯大林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结果,认为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阶段“斯大林都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础上,给他们指出问题,帮他们纠正错误,指出应当避免的危险和应遵循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正因为学习和吸收了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才能认清自己的道路,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领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走向胜利”。^{[10](P270)}1949年10月,《真理报》上的一篇理论文章在解释中国革命的胜利时说:“伟大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不朽火苗照亮了朴素中国人民的心灵。中国近邻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它的发展、革命经验和兄弟情谊,都将有助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人类伟大天才列宁和斯大林预测到中国革命的爆发。他们精辟地阐述了帝国主义对时代民族革命的真谛。这些教导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斯大林同志特别分析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的条件。”^{[16](P563)}

面对来自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的这种理论压力,中国共产党从党与党、国与国关系长远考虑出发,有意识地降低了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的评价。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指出,自有党以来,就是布尔什维克,我们自己的只是枝节、细节,就是灵活性。如果离开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这是行不通的。根本是马列,细节是中国的实际;骨头是马列,肌肉是中国的。这是国际主义。在会上,毛泽东甚至不同意有人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表述,认为这样的讲法有“分配市场”的嫌疑^{[23](P279-284)}。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把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支持称作“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決定条件”,关于中国革命的经验刘少奇则谨慎地指出,这“对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24](P3-4)}。1949年11月,刘少奇在纪念十月革命32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说:“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之下,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中,清楚地了解:由于有了苏联的强大存在,由于有了苏联的榜样和苏联的援助,他们的革命

斗争就能够获得胜利,而今天中国人民大革命也就真的得到了胜利。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每当遇到困难、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们的胜利信心从来就没有丧失过,因为他们看到了苏联的强大存在”。^{[24](P137-138)} 1950年12月,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了朱德一篇纪念十月革命33周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朱德指出:“三十三年来,苏联人民一贯地给予中国人民以伟大的友谊援助。以苏军为主力的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各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是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国际条件。”^{[25](P6)} 这样,建国前后在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表述以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问题上,为了突出苏共和斯大林的理论权威性,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妥协。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举动就是,建国后在出版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重要文献时,考虑到苏共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把凡有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地方一律删去,同时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指示的分量,原来一些没有斯大林的地方加上了“斯大林同志”,并增添了斯大林的引语^{[26](P325-326)}^⑦。同时,也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而改用“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7](P151-280), [1](P534)}。

中共提升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的理论地位,反过来,又推动了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共态度的不断改善。1951年7月1日,在中共建党30周年时,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发表专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的30年》,对中国共产党30年的斗争进行了高度评价,主编米丁还代表编辑部专门给中共中央致电祝贺^⑧。在共产党情报局不断改善对中共态度的背后,其实根本性的因素还是试图强化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忠诚。1954年1月,米丁在关于“毛泽东选集”研究的专题性论文鲜明地、突出地体现和强调了这一点。米丁指出:“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一个特点就是充满了尊崇和热爱苏联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突出地表现了他是苏联人民的忠实朋友,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永恒友谊的真正旗手。”^{[28](P19-20)}

上述这两个因素极大地压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理论的意识形态空间,阻碍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意识形态空间的压缩,尽管在当时还没有马上表现为中共政策的调整,但已经明显地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框架表现得不稳定,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开始向苏联靠拢。因此,从1948年到1953年的5年当中,就出现一种矛盾的复杂现象,一方面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可超越,另一方面又开始以苏联模式为参照考虑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这两个矛盾性的因素暂时统一于“新民主主义政策”上。这样,在共产党情报局针对南共民族主义所掀起的意识形态大批判的压力下,放弃作为一种历史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一个选择时机和条件的问题了。

三、共产党情报局对苏联模式的强化提供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替代模式

“二战”结束初期,苏联在东欧的外交目标是保证东欧政权的亲苏性质,但面对马歇尔计划提出后东欧一些国家的离心倾向和南共对苏联安全利益的威胁,斯大林开始认识到要控制住东欧国家,使之成为苏联的安全屏障,必须要使东欧国家与苏联在制度上一体化。共产党情报局提出并强化“两个阵营”的理论观点,持续性地开展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实质都在于维护苏联在东欧的战略利益和推动东欧国家的苏联化。在共产党情报局的推动和监督下,到1953年,东欧国家基本上整齐划一地完成了向苏联模式的转型。

从共产党情报局的活动来看,东欧国家的苏联化主要是通过向东欧国家灌输以下两个理论观点展开的,一是强调人民民主具有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二是强化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

“二战”结束初期,东欧国家试图在抵抗德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国内各阶级政治联盟的基础,通过人民民主的道路,而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根据这种人民民主的设想,东欧国家最初都保留着议会制、多党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对于东欧通过人民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探索,斯大林最初出于维护美苏欧洲利益的平衡予以肯定和支持。但随着美苏关系的对立明朗化,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后斯大林开始否定东欧的人民民主道路。1947年6月,日丹诺夫在联共中央主持的一

次大型哲学研讨会上说,除了我们,“还有谁能帮助我们国外的朋友和兄弟用科学社会主义意识的光芒来照耀自己争取新社会的斗争的道路,除了我们,还有谁能启发他们,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武装他们!”^{[29](P34)} 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不久,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就指出:“不应当承认以下断言是正确的:每个国家以自己的、完全独具特色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么说就意味着否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国际意义。”^{[29](P211)} 为了给东欧国家向苏联模式转型提供理论支持,1948年12月6日斯大林就保加利亚工人党“五大”政治报告的修改问题在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指出,过去承认东欧可以不采取苏联的过渡形式,而走代议制的道路“是有过失的。我们承认这一过失”,人民民主制度“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项职能”,“人民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30](P319)} 在当时的环境下,强调人民民主制度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并不是一个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实质上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性,即为苏联模式向东欧的扩展提供理论桥梁。对于这一点,捷克党的领导人斯兰斯基明确指出:“以前曾出现过各种错误的表述方式,这些表述方式掩盖了通往社会主义只有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条道路。布尔什维克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我们在所有基本原则都是适用的。”^{[31](P482)} 后来的捷克党的主席哥特瓦尔德说得更是直接:“苏联人民的创造性成就对各人民民主国家说来是特别有意义的。苏联劳动人民的经验是这些国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的主要源泉。苏联的成功不仅使这些国家的人民相信他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而且直接帮助和加速这条道路的进程。”“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成功,向人民民主国家指出了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大大缩短了这些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因而为目前这一代开辟了走向建设共产主义的前途。”^{[32](P9)}

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本来基本上是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成的,“二战”期间与苏联的关系又非常密切。到1948年年底,东欧国家基本上建立了共产党单独执政的政权体系,有些国家虽然还存在几个党,但共产党无疑是垄断政权的。“这些都说明东欧

国家政治体制的苏联模式化已经成型”。^{[33](P315)} 在此基础上,东欧国家开始向私人经济和个体经济进攻,展开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确立起了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1952年,东欧各国建立起了单一的国有制经济。各国国有工业经济的比重分别是:保加利亚100%,捷克斯洛伐克98%,匈牙利97%,波兰99%,罗马尼亚97%。^{[34](P84)} 到1953年,集体化后的耕地占可耕地总数的程度分别是:保加利亚60.6%,捷克斯洛伐克50%,波兰8%,匈牙利建立了5110个合作社。^{[33](P319)} 尽管从数字看,农业集体化的程度并不高,但对于小农经济发达的东欧国家来说,能够实现这些数字,已经是相当高了。在重工业发展方面,东欧各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工业的发展都提出了极高的任务。波兰规定,“一五”后要比1949年增长85%-95%,罗马尼亚提出要比1950年增加一倍,匈牙利的目标是五年期间工业生产增加86.4%,其中重工业增加104.3%。^{[33](P317-318)} 这样,到20世纪50年代初,东欧各国基本建立起了社会经济资源高度垄断在政府手中的苏联式社会经济体制。有意思的是,虽然1948年后,南斯拉夫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但南斯拉夫为了表明自己坚持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民族主义,因此在推动国内发展模式的苏联化方面也走得非常远,试图“用行动来驳斥共产党情报局的指责”。尤其是作为“在战后政治生活中斯大林气味最浓的一项措施”,苏联模式在南斯拉夫农业集体化上体现得更明显。1948年,南斯拉夫有合作社1318个,1949年一年增加了四倍,增长到6626个,1950年总数达到了6797个,有200万社员,约占全国耕地总量的1/5。^{[35](P144)} 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在当时东欧各国党的观念中,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唯一发展模式的不可置疑性。

“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很容易走的道路。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许许多多社会经济成份并存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下进行的。”^{[36](P3)} 如果说,“两个阵营”理论把东欧国家挤到美苏的夹缝之中,使得东欧国家无法“骑墙”,斯大林关于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理论打开了东欧国家通向苏联模式的政治大门,那么共产党情报局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理论的强化则

为东欧国家的苏联化提供了持续性的推动力,或者说,是进入这个大门的钥匙。

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观点是斯大林在1928-1929年间提出来的。1928年7月9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第一次根据沙赫特事件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件稍微重大的政治或经济事件不反映出城市中或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存在。”“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37](P148,149-150)}1929年4月,在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进一步把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放到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中来理解,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38](P136,137)}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高压与强制被赋予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使得苏联在结束了带有市场经济倾向的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后走上了以计划为主要特色的强制发展的苏联模式道路。^{[39](P126-130)}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在批判南共民族主义时就运用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认为南共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不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如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的那样,而是阶级斗争的熄灭,如像布哈林式的机会主义所断言的那样,后者曾鼓吹资本主义和平生长为社会主义的理论”^{[12](P41)}。苏共著名的理论家尤金(尤津)明确指出:“苏联的经验教导我们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在经济方面,以及在政治思想方面,都必须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40]当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被灌输到东欧各国党的头脑中后,东欧国家的苏联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方向。关于这一点,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在1948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只有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即阶级斗争的道路。这种阶级斗争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29](P200)}在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上,德治高度评价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出:“必须像布尔什维主义所教导的那样经常记住:应该消

灭那由一种错误假定中产生出来的机会主义的自满情绪,按照这种假定,仿佛敌人将因我们力量增长而愈益驯服和愈益温和。这样的假定是根本不正确的。应该记住,敌人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会愈加乐于采用‘极端手段’。”^{[12](P134-135)}这一方面为前一时期的东欧国家的政治清洗进行了理论辩护,另一方面又推动了政治清洗运动的升级,从而为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全面苏式化提供了推动力。

东欧从人民民主制度向苏联模式的转变对于正在进行新中国制度蓝图设计的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第一,毛泽东开始修改20世纪40年代中期反复强调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41](P284)}及其与苏联政治制度相区分的观点,在东欧国家人民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化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对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框架下联合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必要性开始产生了动摇。在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文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国共产党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42]随后,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48年12月30日《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提出并对外公开使用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其实已经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43]1949年2月初在与米高扬的谈话中,毛泽东则明确指出:“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44](P273)}从不提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形成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概念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认识,在越来越深的程度上展现出了共产党情报局对新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影响。第二,面对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国内小农经济占优势、富农经济不断滋长、私人经济部门过大、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导致外资入侵等“企图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并永久地保留南斯拉夫的阶级关系”^{[31](P590)}的批判,毛泽东开始放弃过去把新民主主义经济称为“新资本主义”的提法,改变了过去对私人资本和外资经济的重要性的高度强调。

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会议上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指出:“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

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45](P110)} 1945年6月21日,也就是在“七大”闭幕10天后,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著名社论,这个社论在引证没有修改的《论联合政府》的基础上,批判了那种“企图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的错误认识,指出,在中国“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它发展的宽广的可能性和必要,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我们所要发展和必须发展的,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虽然社论中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不应“操纵国民生计”的原则,但这个原则主要是为了防止自由资本主义转向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因为在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下,“自由资本主义要遭受致命的摧残,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发展了。”^[46]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原则不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是对它的一种保护和推动。同样,社论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营经济的作用,但却看不出有要让国营经济去领导资本主义经济的意思。但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则指出:“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47](P139)} 强化国营经济的重要性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框架的重心开始出现偏移。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华总社在一份关于新闻政策的指示中说:“不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一般工商业资本家也是革命动力,似乎他们的恢复与发展营业,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征,似乎我们有义务一般地帮助他们的恢复与发展营业。”^{[48](P496-497)} 同月,晋察冀解放区在一份关于城市工作的报告中也鲜明地反映了对国营经济认识上的重大变化:“大家在讨论中,反映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认识上的一些模糊观点。许多同志都说,过去对国营企业不了解,尤其不了解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常跟他闹别扭,没有很好的帮助他发展,这是这次大会一个最大的收获。有了这个认识,才能了解我们共产党和资本家不是一回事,他们对我们,我们对他们都不是一个心。”^{[49](P550-551)}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引导国家走上公有制社会,首先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来推动国营经济以及合作社经济的生长与发展,从而得以逐渐控制整个国民经济,造成

剥夺私人资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50](P466)} 显然,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已经发生了与过去不同的变化。

美苏冷战的加剧和战后苏共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控制力的重新加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形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已经不存在再走一条介于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之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立政治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这样,共产党情报局在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国际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环境的同时,又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提供了苏联模式这一替代发展模式。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说:“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要走的道路。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很好地学习。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24](P87)} 对于刚刚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共来说,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向苏联模式过渡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方向。1954年9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明确地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此路不通。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7](P17)}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刘少奇则指出:“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的真理。”^{[7](P26)} 刘少奇这一段话体现出了当时中共认识社会主义的典型思维,即社会主义道路等于苏联道路,苏联道路等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任何一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走苏联道路。在这一思维模式下,对于中国来说,在

中止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之后,剩下的问题只能是通往苏联模式的具体时间设定了。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努力的目标。但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历史活动的中共而言,由于社会经济落后的落后性则把社会主义看作为长期奋斗的理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不急于在条件不够的情况下推进社会主义,但在共产党情报局的理论和政治影响下,新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比过去预想得早得多地提到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①,中止新民主主义和向苏联模式不断靠拢,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方向,这构成了战后苏联模式世界推广过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苏联模式是斯大林在长期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形成的特定体制。从发展特点看,苏联模式主要是以重工业的发展为主,特别是以军事工业的发展为主,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从体制特点来看,则主要是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高度集权为主,忽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多样性。这样一种体制模式,既包含着苏联的特殊经验,也具有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长期以来被看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经典模式。^[51]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条件下,无论对于东欧国家还是对于新中国而言,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质上就是向苏联模式过渡,反过来,选择了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选择了苏联模式。因此,不难理解,既然中国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么,也就是苏联模式开始在中国得到了确立。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中认识到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确立与新中国对苏联的模仿和照抄照搬有着重要的关系,但从前述的研究来看,这一认识还是不够的。新中国之所以模仿和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是在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后对中国共产党整体影响下发生的,如果没有这一影响及其引起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异变,按照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构想,很难想象新中国会如此快地开始向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后,经过三年多的时期,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方面开辟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过渡之路,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着重大的意义。但由于改造和过渡的目标已经被定位在苏联模式上,因此从最后的目标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质上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后来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52](P376)}。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确立是“一边倒”外交战略下中国在发展模式上的唯一选择。从这一时期东欧和中国相互对应着来看,苏联通过共产党情报局这一组织机构完成了与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制度一体化发展,至此,共产党情报局也完成了其作为苏联控制下的一个特殊国际机构所承担的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但与东欧共产党和工人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并不是在苏联红军的刺刀下获得的,而是依靠自己长期的革命斗争赢得的,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所具有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品格。一旦当毛泽东意识到苏联背后的控制和国家利益,以及苏联模式的弊端,改革苏联模式的问题也就必然地要提了出来。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改革苏联模式实质上也是一个摆脱共产党情报局影响的历史过程。如同苏联模式在中国的确立是以接受共产党情报局“两个阵营”理论为前提一样,对改革苏联模式的探索也是从重新寻求对世界发展的新认识开始。

注释:

①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含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一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1949年,张仲实在《新中国妇女》第2、3期上发表了两篇讲座,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常识讲座)》,一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常识讲座)》,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它的目的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人民民主专政,然后在适应时机转门(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张仲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常识讲座)》,《新中国妇女》1949年第2期,第30页)。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张仲实认为:“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同社会主义社会比较,还差一个历史阶段;但是和我国过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乃至同一般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却是前进了一大步。”(张仲实:《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常识讲座)》,《新中国妇女》1949

年第3期(第30、31页)。这两个材料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史上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把新民主主义理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即便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

②在此有必要提及一下目前反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观点的相关档案文献状况。对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度肯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论点,也是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一个核心思想。1945年5月5日的《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国人民胜利的指南——读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义这样一种思想,是从无量数的事实中得出来的真理,而这一真理,这一思想,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在毛泽东同志的整个报告中。”建国后,《论联合政府》收入到了1953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1953年4月10日的《人民日报》在介绍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所收入的《论联合政府》时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全面地总结了抗日战争八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团结全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这个报告继‘新民主主义论’收到了动员全国人民的极大效果。”《人民日报》的这个介绍没有提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其原因在于毛泽东对其这一思想进行了修订。《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所刊载的报告原文,在关于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指出:“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因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但修改后,这一段话变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因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毛泽东在当时的背景下修改《论联合政府》应该说是具有重要意图的,表面上看是文字上的修改,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在理论上压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空间。20世纪90年代后出版的新的文献中,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核心思想的原初内涵。比如,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收集了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程度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

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在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在上述引文中,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是“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并且“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这与建国前未修改的《论联合政府》的观点是相互支持和彼此印证的,表明了当时毛泽东对战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高度。但修改后的《论联合政府》通过增加一些限定性的词汇体现出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在认识上降低了。同样是七大时期针对同一问题的讲话,不同的文献反映出不同的认识状况。

③这一点始终是苏共指责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的表现。直至20世纪80年代,苏联有关中苏关系的著作评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时,仍然认为“毛泽东坚决提出这样一种思想:中国过渡到建设社会主义,那是十分遥远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提到日程之前,中国应当经过相当长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是“1945至1949年间中共领导人的反苏民族主义表现”(〔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1页)。这表明,在苏共的正统理论中,始终没有承认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科学性。

④关于东欧各国党内清洗的具体情况,也可参孔寒冰:《东欧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0-335页。在这里,作者翔实地介绍和分析了东欧各国党内清洗的发动、主要案件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⑤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又说民族主义,又说民族独立;又说南斯拉夫是反动的民族主义,过去我们也讲过三民主义,其中就有民族主义,这些问题怎样解释?”这表明,当时毛泽东并不十分清楚究竟什么是民族主义(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530-531页)。在不十分清楚民族主义的含义的情况下,支持并加强对南共民族主义的批判,说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想表明在政治上是与苏共和共产党情报局站在一起的。

⑥需要指出的是,这显然不是刘少奇的真实认识。在1949

年11月16日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开幕词的讲话中,刘少奇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并详细地从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理论建设和武装斗争四个方面总结了革命公式和基本经验(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167页)。这种表述上的差异本身也可以说明这一时期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⑦这一点在当时甚至影响到了对中共党史的理论解释框架。1951年胡乔木在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时说,“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则的指导下成立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点。但是为要领导中国革命达到胜利,仅仅依靠现成的一般原则的指示是不够的。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指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在当时的情况下,胡乔木的这个讲法应该说是非常巧妙的,它既突出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的重要性,也包含了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贡献。最极端的是陈伯达在1949年为庆祝斯大林70寿辰而撰写的《斯大林与中国革命》一文,这篇文章完全是站在斯大林的观点上来分析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理论活动的,认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终于在曲折的道路上,克服了客观的困难和主观的错误,而把革命进行到胜利,就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关于中国革命策略问题,是追随斯大林的学说,是和斯大林的思想完全一致的,并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发展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在陈伯达的理论解释中,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是因为毛泽东“用最高的热情,来阅读和深思熟虑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种著作”,是因为毛泽东“特别喜欢咀嚼”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是因为毛泽东“特别喜欢反复引用”斯大林的著作,根本上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是斯大林的学生和战友”(陈伯达:《斯大林和中国革命》,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15-17页)。中共在对自身历史的解释中提高斯大林的理论地位在当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因此也就有各种不同的猜测。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在一份关于毛泽东作为理论家和领袖的研究报告中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象征性地服从于苏联的最高领导地位”,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毛泽东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最新的动向就是其地位的真正变化,或者只代表对世界充满铁托分子的现实调整。”(沈志华、杨奎松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

(1),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562页)。

⑧参见《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90期(总第138期)。后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断加强。1954年8月,米丁致信中共中央,希望中共中央能够派人参加该刊物编辑部的工作,具体要求是: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熟悉中国党的生活、做过党的工作和新闻工作,并且是省级以上报纸的负责人。1954年10月,经刘少奇批示,中共中央派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祖春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338页)。在当时,只有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党的代表才能够参加其机关刊物编辑部的工作。

⑨关于这一问题,党史学界的争论是比较大的,但正如龚育之所说的,在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根据多方面考虑和比较的原则,也设想将来要不要、能不能也像苏联和南斯拉夫(实际上)那样实行一党制,探讨过这样做有什么利弊,这样的可能性,是不必排除的”(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⑩这个材料实际上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经济重心的重大变化。关于这一问题可详参任晓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和理论起源》,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149页。

⑪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在党的高层已经开始思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时,普通的党员群众接受的还是早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思想观念。1949年7月,署名李黎的撰述人编写了一本《新民主主义问答》的小册子,笔者保存着一本。从这本书上的学习批注以及书背后的八道测验题推测,这本小册子是普通党员群众学习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比较普遍的一本“教材”。该书在论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时说:“须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固然是我们努力的终极目标,但自有其一定的进行的方向和步骤,并不是一蹴可几(就)的,要使原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这种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距离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还有很遥远的一段路程”(《新民主主义问答》,北平万国书店1949年7月,第71-72页)。这里论述的其实还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没有修订时的基本观点。

⑫这句话是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哈尔滨听取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一安等人汇报工作时讲的。199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1978年9月15日记载的这句话则是:“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

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7 页)其中,“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这句话,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没有,但这句话对于理解邓小平对苏联模式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毛泽东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3]解放社编.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M].沈阳:东北新华书店,1949.
- [4]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苏]鲍·尼·波诺马辽夫.苏联共产党历史[M].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60.
-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 [7]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G].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 [8]毛泽东选集[M].沈阳:东北书店,1948.
- [9]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0][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情报局:下册[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 [11]齐世荣.当代世界史资料选编[G].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 [12]情报局会议文件集[G].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 [13]高敬增.试论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功过和经验教训[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6,(1).
- [14][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15]刑和明.中共眼里的苏联模式[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 [16]沈志华,杨奎松.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1)[G].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 [17][俄]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18]薛衔天,李福生.关于中国共产党批判南共民族主义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2004,(1).
- [19]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20]拥护共产党情报局决议[N].人民日报,1949-12-04.
- [21]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 [22][俄]A. M. 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 [23]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 [24]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25]朱德.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J].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0,(65)(总 104),1950-12-02.
- [26]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27]刘少奇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28][苏]米丁.毛泽东选集[J].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4,(2)(总第 270),1954-01-22.
- [29]孙耀文.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30][保]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秘书的观察和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1]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7 卷[G].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32][捷]哥特瓦尔德.苏联——全世界争取和平与进步的斗争的领导力量[J].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0,(65)(总第 104),1950-12-02.
- [33]孔寒冰.东欧史[M].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34][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35]郝承敦.苏南冲突研究[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7.
- [36]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崇高使命[J].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3,(17)(总第 233),1953-04-24.
- [37]斯大林.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M]//斯大林全集:1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 [38]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G]//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39]任晓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历史和理论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0]尤津.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N].人民日报,1949-09-02.
- [41]笑蜀.历史的先声——《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社论选[G].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
- [42]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J].中共党史研究,2002,(1).
- [43]刘建平.苏共与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确立[J].历史研究,1998,(1).
- [44]我的一生——师哲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45]毛泽东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46]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N].解放日报,1945-06-21.
- [47]毛泽东文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48]中共中央宣传部与新华社总社关于纠正各地新闻报道中右倾偏向的指示[G]//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下转至第 47 页)

密的知识体系 需要一定的专业基础才能真正把握。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需要普通民众也能予以接受,要做到这一点,社会精英特别是其中的管理者不仅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而且要以自身实践来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要务是理论研究,而不是政治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需要在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意义上得到体现。这样,才能建构一个完整而又严密的解释体系,首先要说服社会知识阶层树立信念,然后才能通过他们说服一般民众,成为民众信仰。

第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原则是思

想解放,而不是固步自封。中国改革是从破除“两个凡是”起步的,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应该是破除新的“凡是”。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只要它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没有最终实现,就需要不断依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调整自己的理论形态。

参考文献:

[1]郑永年.世界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9,(5).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海波]

“Three-izations” of Marxism and the Law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YU Jincheng

(Institute of Socialism,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Xiqing,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From a macro-level perspective, the law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resides in the space, time, and subject presented by the sinicization, tempor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t is both embodied in the accommodating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on relationships and the superstructures, and expressed as an intrinsic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synchronicity and diachronicity.

Key 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emporization; Popularization; Law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上接第38页)

[49]罗玉川.关于发展经济建设城市的报告[G]//晋察冀解放区历史文献选编(1945-1949).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50]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M].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51]赵曜.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回顾和理论思考[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6).

[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郭彦英]

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and Historical Fate of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Society: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for the Switch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viet Model of Socialism

REN Xiaowei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f Marxist Theory,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The 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Cominform) was a special international agency established in 1947 with the promotion from the Soviet Union. Althoug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not a member of the Cominform, the theories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latter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from various aspects on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society around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cceptance of Cominform's theory about "two blocs" change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background for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society. The support for Cominform's criticism against national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Yugoslavia compressed the ideological space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society. Simultaneously,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development was provided with the Cominform's aggrandizement of the Soviet model.

Key Words: 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new democratic society; Mao Zedong